

《检论》的文化史意义

姜义华

(复旦大学 历史系, 上海市 200433)

摘要: 章太炎《检论》的撰作起源于对其《馗书》的增删修订, 但就内容与性质而论, 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馗书》的目的在颠覆传统的思想模式, 引导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制度、文化, 而《检论》则意在为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创建一种结构, 提供一个标准。从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文化创造、历史发展等视域, 《检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总检核, 以发现问题的症结、推动中国得以前进的动力资源。

关键词: 《馗书》 《检论》 章太炎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检论》系由《馗书》修订增补而成。

《馗书》修订本出版后, 在学人中产生很大影响。经过三年禁狱生活, 两年多主编《民报》的实践, 章炳麟对许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因此, 在《民报》停刊以后, 他就开始着手再一次修订《馗书》。他在《自定年谱》宣统二年即1910年条下即记, 在先后撰成《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三书, 并撰写《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时, “《馗书》亦多所修治矣”^[1](宣统二年庚戌)。

现存这一手改本由北京图书馆收藏。1974年12月在该馆大力支持下, 我将这一手改本与《馗书》原刊本及其后出版的《检论》逐篇逐字作了核对、校勘。稍后, 将相关笔记及《馗书》校改本借予汤志钧, 蒙他摘引入《章太炎年谱长编》, 见该书上册第339页至第343页。由于笔记上有些字句比较潦草, 或用速写方式, 该书在摘引时不免发生若干讹错。今据原笔记, 将手改本情况介绍如下:

手改本是以《馗书》东京翔鸾社“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七年秋七月再版”本为底本, 版权页注明此书初版时间为“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五年夏四月出版”。初版时间是1904年, 这一再版本出版时间是1906年。

手改本的构想, 是在《馗书》东京版基础上作若干充实、调整, 对原有论文作若干改动。

第一篇《原学》, 有改动, 后又全删;

第二篇《订孔》, 作了较大修改, 但与《检论》所收《订孔》上、下不同。值得注意的修改, 一是将论荀子“其正名也, 世方诸认识论之名学, 而以为在琐格拉底、亚历山大德间”一段, 改为: “其正名也, 与墨子相扶持。有所言缘, 近浮屠之义。及道家有庄生, 始为《齐物》, 又远出孟、荀上。”这反映了他研究墨子、因明学和《齐物论》的心得。二是将“况于孔氏, 尚有踊者, 孟轲则蹶矣, 虽荀卿却走, 亦职也”, 改为: “况于孔子, 尚有踊者, 孟、荀则逡遁矣, 庄周勿能与并持世, 亦职也。”以下删去原文中注释及“名辩坏, 故言; 进取失, 故业堕”一段, 增加一段新的论述: “且古者世禄, 子就父学为畴官, 故学有称家。……九流称家, 已非畴官之学矣, 然名犹袭其故。……自老 写书征藏以诒孔子, 然后竹帛下庶

人。六籍既定，诸书复稍稍出金匱石室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不曰贤于尧、舜，岂可得哉？”三是于原文结语“孔子死，名实足以侘者，汉之刘歆”下，新增一段：“书布天下，孔子之功，其后有刘歆、冯道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史乘亦绝，民不知古，乃无定泉；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民间独有五经、《论语》，犹非师授不能得，自余竟无传者。……向、歆理校讎之事，书题杀青，复可移写赁鬻，后汉之初，王充游洛阳市肆，已见有卖书者，……然以钞撮重繁，犹多窒滞，及冯道为镂版之术，而负贩益易矣。……三君学术道行固有高下，或乃山头井底不足相喻，然其发舒民智一也。”

《订孔》之后，新增一组专论儒家的目录：《原儒》、《原经》、《六诗说》、《小大说》上下、《八卦释名》、《孝经说》。这一组文章，前三篇稍后收入《国故论衡》，后几篇以后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原《儒墨》，改名《原墨》，改动后，与《检论》所收录者相同。原《儒道》全删。目录列入《原道上》、《原道中》、《原道下》，后来收入《国故论衡》。《儒法》改名《原法》，变动较大，而又不同于《检论》所收录者，其中论法律缘起与沿革尤值得注意：

管子曰：“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七臣七主篇》）又曰：“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七法篇》）此则法以明刑，今之律矣；律以定分，今之格矣。……科条不厌其繁，著于传记者，律有甲、乙、丙，始李悝；令有甲、乙、丙，始周威公。董仲舒为《春秋》折狱，引经附法，异道家、儒家所为，则之徒也。何者？法律繁苛，未足以饶民；饶民者，在亿察无征之事。汉文帝时，有侯之律，益以叔孙通傍章十八，法益碎矣。

还有一段，专论法与德及礼的关系：

法之禁者，喜舍事状而占察人之心术。反唇有诛，腹诽有刑，教天下谄，为人主一己之便。……藉令为民德计者，乃者长老父师，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非法令所能就也。立法之意，止于禁奸，使民有伪行而已。欲以法令化民，是闻括足以揉曲木，而责其生楠聆风，民未及化，则夭枉者已多矣。

《原法》之后，目录中又增《原名》、《原五家》、《正见》三文，当即稍后收入《国故论衡》的《原名》、《辨性》上下及《明见》。

《儒侠》略有删节，与《检论》所收者不同。《儒兵》改为《原兵》，改动较大，但较《检论》中《本兵》简略。

《原兵》之后，目录中增加一篇《第七十子》，该文未见。以上一组文章，论先秦诸子。

《学变》前增加《征信论》上下篇及《秦献记》，由此开始论历代学术沿革。后来，《征信论》与《秦献记》均收入《太炎文录初编》。

叙述历代学术沿革的《学变》、《学蛊》、《王学》、《颜学》、《清儒》、《学隐》等文，大多有所改动，与《检论》亦不全同，甚至差异较大。《学变》与《学蛊》之间，曾插入一篇《思乡愿》，这一篇后来也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学蛊》修改稿，其后《检论》则舍弃未用。

《订实知》与《通讎》，改成《通讎下》与《通讎上》，后又改题为《非讎下》与《非讎上》，增删幅度都很大，后来，在《检论》中，与原《原教下》、《封禅》、《河图》共五篇合并为《原教》一文。

《原人》、《序种姓》上下篇、《原变》、《族制》及其附录《许由即咎说》这一组文字，改动最大的是《序种姓》上篇，删去了有关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全部内容，改而论证“黄帝之

起，宜在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间，北底雍、则附，南抵滇、黑水则附荆”，“虽神农，亦产楼兰、西间”。《族制》及其附录则全删。其余修改不多，与《检论》所收录者相同。

《民数》一文，增补两则注，正文中史实亦有所充实，和后来《检论》所收录者相同。

《封禅》作了很大修改，后来改题《议封禅》，最后全文删去，成为《检论·原教》中一节。《河图》有个别词句改动，后来也成为《检论·原教》中一节。

《方言》在叙述各地方言声韵变化轨迹时，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删去先前一些论断；在方言种类方面，删去湖南一种，又增加一段，论南北朝时方言变化情况，与《检论》所录《方言》正文相同。《订文》及所附《正名杂义》俱有较多增删，凡直接引述斯宾塞尔、亚诺路得等人论说者，尽量删去；增加若干论述，使所论更为准确。《检论》所录此文，与此相同。《述图》增加两段论述、一则注，与《检论》所录者相同。

《公言》，全文删去。

《平等难》，目录中题目未改，书中题目改成《商平》，内容亦作大幅度修改。本篇应是章炳麟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时，在《廌书》原手改本上改定。《廌书》手改本中其他还有若干篇，如《明农》、《定版籍》、《订礼俗》、《相宅》、《地治》、《消极》等，也是如此。除去这些文章直接涉及辛亥革命后事件，因而可断定是在被禁期间对《廌书》作进一步修改时定稿外，还有一些文章，显然也是这一时候方才决定如何处理。最为明显的就是《平等难》之后的《明独》与《冥契》，手改本目录中保持未动，《检论》中则删去，即是被囚禁时进一步修订《廌书》并编为《检论》时决定的。

《廌书》自《通法》至《定律》一组文章，改动幅度较大。《通法》充实了古代政法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官统》上中下三篇，目录中存《官统上》，《官统中》改为《官统下》，注明该文“即《官制索隐》”；《官统下》删去，改为《五术》一文。《官统上》有若干重要修改，但是，在北京被囚期间进一步修订《廌书》时，他又有了新的想法，在书中将篇题与内容全部删去，《检论》中《官统上》为新撰。《官统中》改作《官统下》时，充实了约三分之一内容，修改后文字与《检论》所收《官统下》相同。《官统下》题目改成《五术》，改动幅度较大，和《检论》所录者同。《官制索隐》后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商鞅》篇增删修改较多；《正葛》在目录中改为《评葛》，书中题目改作《议葛》，全文又复被删。《检论》中《思葛》前半篇全部新撰，后半引用《正葛》主要内容。《刑官》与《定律》俱有字句修订，同于《检论》所收；而《刑官》目录之后，原拟增添《说刑法》、《五朝法》二文，《检论》中均未收，《太炎文录初编》则收入《五朝法律索隐》及《说刑名》。

《不加赋难》以下一组论经济的文章，《不加赋难》题目改作《谴虚惠》，《明农》、《禁烟草》、《定版籍》与《制币》题目均未变。但《检论》中未收《禁烟草》，《制币》全部重写，题目改为《惩假币》。其他各篇手改本中所改与《检论》相同，皆为被囚禁时改定。

《弭兵难》目录中删去，改成《代议然否论》，但书中《弭兵难》与《经武》均保留，《检论》则皆未收。《代议然否论》则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

《议学》仅删去文末一个注。《原教》上下目录中均保留，书中《原教上》全删，《原教下》作了大幅度修改，《检论》中《原教》即此篇与《封禅》、《通谶》、《河图》、《订实知》合成。这两篇当是被囚时所改定。《争教》有改动，与《检论》所收录者又不同，当是1910年时所改。《忧教》，目录中保留，书中加了长注，后来在《检论》中又经增删，并入《争教》文中。《订礼俗》手改本中作了多处增补，收入《检论》时，又有增补，是知该文两次

作了修订。《辨乐》正文文字略有修订，较《检论》多一长注，是知该文亦是两次修订。

《相宅》与《地治》，俱与《检论》相同，应都是在北京囚禁时改定。《消极》，在目录中改成《消道》，书内又改成《无言》，此当为北京被囚时所改。《消道》之后，目录中原加一篇《告王鹤鸣》，当即《太炎文录初编》中《与王鹤鸣书》。

《尊史》以下论史文章共八篇，目录中俱未改，只在《哀清史》后增加《国风》、《诗》、《伤徐锡麟》、《告刘光汉》四篇文章目录，《解辫发》下增加《志六国》与《告刘揆一》两篇文章目录。在书中，《别录甲》题目改成《杨颜李别录》，《别录乙》题目改作《许二魏汤李别录》。除《征七略》与《解辫发》未作修改外，其余各篇都有局部修改。后来，《检论》未收录《解辫发》，其余各篇与《书》手改稿本相同，表明它们俱改定于北京被囚禁时。

北京图书馆所藏《书》手改本，绝大多数文字修订于1910年前后，少量改定于囚禁于北京期间。1911年11月回国后，忙于政治活动，《书》修订工作显然停了下来，原书置于篋中。1913年他北上向袁世凯抗争时，书稿未带在身边。1914年迁居北京钱粮胡同后，他开始考虑继续完成此书修订工作。8月11日，他致书龚宝铨，要他将“自著《书》改削稿本”带到北京。8月20日，他再次致书龚宝铨说：“唯篋中尚有改定《书》，未能惬意，今欲重加磨琢，此稿亦望先期带致也。”9月3日，他又一次催促龚宝铨：“篋中尚有《书》改本，亦望速记，拟再施笔故也。”10月15日，他更急切地致书龚宝铨：“唯《书》改本一册，尚未大定，即可钞录大略，原本俟德玄来京时可速带上，拟再有增修也。”^{[2](478-480)}这几封信，反映了章炳麟对原改削稿本是如何重视，而重加磨琢、再有增修的心情是如何迫切。

从《书》改削稿本可以看出，起初，章炳麟仍是在《书》原本上继续修订，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书》原先架构已不足以容纳他这时对于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终于决定对《书》作全面重构。这也就是他在自定年谱1914年条下所说：“余感事既多，复取《书》增删，更名《检论》。”^{[1](民国三年甲寅)}感事既多，是了解《书》改定为《检论》的关键之所在；完成改定，则在1915年4、5月间。¹

1915年5月《时报》刊登的《章氏丛书》广告中特别说明：“《书》一种，先生改名《检论》，大加修改，与初印本绝异。”^[3]绝异，就不是一般性差异，或仅在篇幅上、文字上有些差异，而是在基本意图上两书明显不同。这从《检论》的取名及《检论》内容的构成，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为什么取名《检论》？“检”字含义，在《文始》七有一段专门论述：

《说文》：“桺，檻也。以臧虎兕。古文作。”此初文也。旁转谈变易为檻，梳也。……檻作喉音对转宵孳乳为校，木囚也，其不系囚执者，亦引申孳乳为闾，门旁户也。为闾，开闭门也。为，检桺也。旁转孳为检，书署也。《地官·掌节》注所谓斗检封，谓于两相合处印封之也。《法言》云：“蠢迪检桺。”检对转宵亦为校，通言检校。……检桺之义又孳乳为敛，收也。……检校之义又孳乳，问也。即今考验字，对转宵变易为核，实也。考事笮邀遮其辞，得实曰核。^[4]

检字，溯源于桺，“檻也，以臧虎兕”，和章炳麟身被幽囚、一切政见被严禁发表的境遇完全吻合。检，与桺相连，又有规矩、法度、矫正之意。《汉书·扬雄传》：“君子纯终领闻，蠢迪检桺。”颜题古注：“蠢，动也。迪，道也，由也。检桺，犹栝也，言动由检桺也。”

¹ 1915年4月24日章炳麟《致朱逊先书》：“刻《国故论衡》改订已了，正可钞写。《检论》亦在改订，正可誊钞。”表明这时已确定以《检论》为书名，并已开始誊钞文稿。

²检与校相连，意为查核；检与 相连，意为整饬；检与详相连，意为考核审定；检与式相连，意为法式、法度；检与核相连，意为考查核实。检字在这里都包含有提供一种准则、坐标的意思。检字，作为“斗检封”，指文书完成以后，装囊加封，于封口加盖印章，“于两相合处印封之”，具有全部完成、待他人启封之意。《馗书》书名更名为《检论》，当包含着这多层意思在内。

《馗书》更名为《检论》，原因在于两书立意有着重要差异。《馗书》是要颠覆传统的思维范式，引导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制度、传统文化。而《检论》的立意，重点显然已不是颠覆，而是为如何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创建一种结构，树立一个标准。这清楚地表现在《检论》的分卷与篇目中。

《馗书》不分卷，《检论》分卷。从《检论》的分卷及篇目设置与增删中，可以清楚看出作者新的意图。

《检论》共分九卷。

卷一，共四篇文章，为《原人》、《序种姓》上下、《原变》，据《馗书》四篇同名文章修改而成。这是研究中华民族的缘起及其演变。与《馗书》相比，最重要的改变是从沿袭西方学者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转变为反对中国人种西来说。

卷二，共十篇文章，另有附录两篇，其中《辨乐》、《尊史》、《征七略》为《馗书》旧文，有所修订，其余各篇《易论》、附《易象义》、《〈尚书〉故言》、附《造字缘起说》、《六诗说》、《关雎故言》、《诗终始论》、《礼隆杀论》、《〈春秋〉故言》俱是新撰。这一卷文章，是专门讨论中华文化原典，亦即中华文化起源。《馗书》基本上未触及这一问题。

卷三，共九篇文章，另有附录两篇。《订孔》上下、《原墨》、《原法》、《儒侠》、《本兵》、《学变》俱据《馗书》旧文改订，《道本》、《道微》及附录《汉律考》、《黄巾道士缘起说》俱新增。这一卷文章，讨论先秦诸子和汉代思想学术演变状况，和《馗书》相关部分比较接近，但论述更为全面，立论也更为坚实。

卷四，共八篇文章。起首《案唐》与《通程》俱是新撰，《议王》与《馗书》及手改本《王学》均不同，实为新撰。《许二魏汤李别录》、《哀焚馗书》、《正颜》、《清儒》及《学隐》俱由《馗书》旧文修订，《正颜》在《馗书》中题为《颜学》。这一卷，论述汉魏以后中国学术、思想、文化演变过程。

卷五，共四篇文章，另附录一篇。《民数》、《方言》、《订文》及附录《正名杂义》、《述图》，俱据《馗书》旧文增删修订，考察中国人口、语言、文字、图像，这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及中国文化得以形成和传播的主要工具。

卷六，共五篇文章。《正议》为新撰，《商平》据《馗书·平等难》改写，《原教》由《馗书》中《原教下》、《封禅》、《通讖》、《订实知》、《河图》五文合并改定，《争教》与《订礼俗》据《馗书》同名两文修订而成，《馗书忧教》全文并入《争教》。这一卷，研究共和、平等一类人们的日常思维，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是中华文化中最具大众性、世俗性的部分。

卷七，共十二篇文章，专论中国制度文化。其中《通法》、《官统》上下、《五术》、《刑官》及《谴虚惠》、《相宅》、《地治》，讨论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律制度；《明农》、《定版籍》、《惩假币》，讨论中国经济制度；《无言》，讨论近代以来制度变革的得失。这一卷文章，除

²见《汉馗书》。扬雄：《扬子法言·法言序》：“蠢迪检押。”李轨注：“蠢，动也。迪，道也。检押，犹括也。言君子举动则当蹈规矩。”

去《官统上》和《惩假币》为新撰外，其余各篇，俱据《 廋书》原文改定。《五术》原为《官统下》，《遣虚惠》原为《不加赋难》，《无言》原为《消极》，其余各篇使用原题。

卷八，共四篇文章，附录一篇。《杨颜钱别录》，《廋书》中原为《别录甲》；《杂志》与《哀清史》与《廋书》旧文同题；《对二宋》系新撰；附录《近史商略》也是新撰。这一卷论民族冲突中特别是清朝统治下人物行事。

卷九，共七篇文章，附录一篇。除《商鞅》、《正葛》系据《廋书》旧文修订外，《非所宣言》、《伸桓》、《小过》、《大过》及《近思》，附录《光复军志序》俱为新撰。这一卷结合历史和辛亥革命成败历程的回顾，对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检论》上述九卷六十二篇正文与七篇附录的构成，非常醒目地表明作者试图对中华文化作一总检核。1903年章炳麟因《苏报》案被羈囚于上海时，曾感叹说：“上天以国粹付余，……岂直保守残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正是这样极为强烈的民族文化“恢明而光大之”的使命感，使他悲叹，在他牺牲之后，“支那闷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为此，他深为自责：“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在编定《检论》之前，1914年5月决定以绝食向袁世凯抗争时，在给汤国梨的家书中，章炳麟又一次感叹：“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5]在给龚宝铨的诀别信中，他特别写道：

夫成功者去，事所当然。今亦瞑目，无所吝恨。但以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所著数种，独《齐物论释》、《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三种，先正复生，非不能为也。虽从政蒙难之时，略有燕闲，未尝不多所会悟。所欲著之竹帛者，盖尚有三四种，是不可得，则遗恨于千年矣。^[6]

“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新的会悟不能著之竹帛，将“遗恨于千年”；“中夏文化亦亡矣”；这种中华文化的神圣使命感，是章炳麟修订《廋书》编定《检论》的最大的精神动力。要了解《检论》的谋篇布局及其内容实质，也应当由此入手。

《检论》将研究中华民族起源及其演变的四篇文章列为第一卷，显示了章炳麟仍将民族主义列为首要诉求。《原人》中所说的“一切以种类为断。是以综核人之形名，则是非昭乎天地”^{[7](P360)}，作为《检论》首篇文章的总结论，贯穿于《检论》全书，成为作者检核中华文化的总纲领。卷四《哀焚廋书》重申：“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7](P468)} 卷八《对二宋》中专门记述作者同宋恕的一场争论。宋恕认为，中国应以立宪为本，“诚欲尽善，宜以大议属之庶人，则天下驩应，湔其旧污。所谓宪政者，如执辔然，总御不纷，而驯驯如舞焉。此所以为易简也。”章炳麟反驳说：“今中夏欲完强如东国者，非唐慕之也，又不可苟效宪政以迎致之，莫若理其本。理其本者，当除胡虏而自植。吾夏人宗国不，则耻以鬻降为宠，然后举不失劳，官不失材，使彘之善柔巧宦者，无敢微幸以致儋石。其意者骄泄渐除，而勤业稍众矣。今是言宪政者，非诚有所识于本株也。”^{[7](P598)}章炳麟通过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的实践，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振兴，不是靠侈言宪政，而是必须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辅万物之自然，以百姓心为心，对旧法素俗进行切实的改革。他批评高言宪政者：“今议者多大声色，侈章奏，以自贾煊，徒言法蔽，不课其是非。顾未有一言以攻恶吏幸臣，竞扇宗羲治法之虚言，而以荀卿治人之文为讳。此徒见其谄谀贵势，不诚有救国心也。”^{[7](P599)} 倡导民族主义，目的是要借此扫除中国振兴途中的主要障碍，即“狃习为奸，苞 上流”的旧官僚机器。他就此写道：“今不课吏人贞邪，徒曰立宪可以定之，建议可以已之。此所谓以《孝经》治黄巾也。是故处今之世，不诛□□□旧吏，去其泰半，其佗不□□。然是又非寻常所能就也，须于光复则大黜之耳。不戮其人，纵令立法踊于日本，终不可以为善国矣。”^{[7](P598)}

近代中国，由于自然经济在大部分地区仍然占居支配地位，统一的国内市场远未形成，在国际竞争中缺乏必要的经济实力，文化的民族主义便远远凌驾于经济的民族主义和政治的民族主义之上，而特别活跃。《检论》对于中华文化的总检核，正是从民族命运的兴衰着眼的。《检论》因此也就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一部代表作。

在追溯中华文化源起时，《检论》与《 廋书》相较，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对儒家经典及孔子本人思想由贬转而为扬。《订孔下》曾特别述及作者认识上的这一重大转变：

往时定儒家，莫若孟、荀。私以《论语》 ，《三朝记》与诸告饬，总纪经记，辞义 如也。……怀是者十余年，中间颇论九流旧闻。上观庄生，为《齐物论释》，又以闲暇，质定老 、韩非、惠施诸书。方事改革，负 东海，独抱持《春秋》，窥识前圣作史本意，卒未知其道术崇庠也。

以炎、黄、誉、尧之灵，幸而时济，光复旧物。间气相 ，逼于輿台。去食七日，不起于床， 然叹曰：余其未知 里、匡人之事！夫不学《春秋》，则不能解辨发，削左衽；不学《易》，则终身不能无大过，而悔吝随之。始 爻象，重籀《论语》诸书， 然若有 者。……上观《周易》，物类相召，势数相生，足以彰往察来，……洋洋美德乎！诚非孟、荀之所逮闻也。诸所陈说，列于《论语》者，时地异制，人物异训，不以一型铜铸，所谓大道固似不肖也。^{[7](P425-426)}

先前认为孔子道术远不及孟、荀；《国故论衡》中还评价《春秋》言治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而在被袁世凯囚禁期间，特别是在绝食七天之后，对于《春秋》、《易》、《论语》都有了新的评价。《订孔下》中这一段话对于《春秋》、《周易》和《论语》的评价，否定了《 廋书》及《国故论衡·原经》中原先的评价。对于《周易》及《春秋》的评价，还更具体地表现在《检论》卷二《易论》、《春秋故言》等文中。

《易论》论定：《易》“六十四序虽难知，要之记人事迁化，不越其绳，前事不忘，故损益可知也。夫非讖记历序之侪。”如六十四卦中乾、坤二卦以下屯、蒙、需、讼、师、比、履、泰、否九卦，便记录了人类由草 渔猎时代一步步走向建立国家、以类族辨物的历史过程，“此九卦者，生民建国之常率，彰往察来，横四海而不逾此。”^{[7](P380-381)}

《易论》特别关心宇宙运动的一般规律。作者认为，乾元恒动即今所谓永动力，坤元恒静即今所谓永静力，“群动本无所宗，……群动而生， 溢无节，万物不足供其宰割，壤地不足容其肤寸，虽成既济，其终犹弗济也。”^{[7](P383)}正是在绝食期间，深入思考了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他对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将产生，从宇宙到人类，将永远处在矛盾运动之中，有了新的理解：

章炳麟曰：《易》本衰世之意，时乱故得失彰。…… 光复以还，绝世未得继兴，膏泽未得下究，诸志士献民，生存未得相廷劳，死亡未得相吊唁也，而逋寇尚有禄胙，庇其族姻，向之降虏，犹持权藉，姹肆不衰。夫成败之数，奸暴干纪者常荼，而贞端扶义者常口，……由是言之，“既济”则口，“未济”其恒矣！^{[7](P385)}

《春秋故言》，除去重申过去他一直所坚持的《春秋》只是往昔先王旧记，年事相系，为百世史官宗主，而不可能是为汉制法等论点外，一是进一步强调“国无史则人离本，……史亡则国性灭，人无宗主，沦为裔夷”；二是突出了“《春秋》乐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族性，……为中国存种族，远殊类”，树建了中国民族主义传统。^{[7](P412)}这也就是章炳麟所说的“不学《春秋》，则不能解辨发，削左衽”。

然而，尽管《检论》确认《易》、《春秋》、《论语》识见高过孟、荀，章炳麟仍反对因此

而将孔子及儒家经典神化。《订孔上》重申：“追惟仲尼闻望之隆，则在六籍”，“继志述事，缵老之绩，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7](P423)}对于《易》、《尚书》、《诗》、《礼》、《乐》、《春秋》，他都从这一角度检讨孔子整理相关古籍的得失，衡量这些原典的文化价值。

在评价《易》时，针对《易》不为小人谋的说法，章炳麟指出：“《周易》所罗，贞邪枉直具举之。诸贪残得志者，《易》所不能刊也。……《易》虽不为暴人谋，暴人固已得志。《易》虽为善人贤士谋，直其恣睢，独有退避求自安全，而固无损暴人毫末。纵谋所以黜削暴人者，比其就成，暴人享之已数世矣。是使暴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偷瞬息之成功也。”^{[7](P383-384)}

在评价《尚书》时，章炳麟指出，上古坟丘刻石纪功，为数甚多，孔子定著《尚书》，“删其矫诬，去其伪辞，归于实录，后之为史取于碑铭者，可以知法禁矣”，不过，“三皇，《尚书》亦不载；而五帝，独纪尧、舜；其孔子时，书缺有间也。”古代《书传》也有数家，孔子同时“序而定之，则平其异同也”^{[7](P387-388)}。孔子时，许多原始文献已经遗佚；后来，经孔子本人删定的文献也缺失大半，解说者“人用其私，而说益譎奇不类”，《书传》失传，终于使《尚书》“二十九篇虽在，亦由废绝而已矣”^{[7](P389)}。

关于《诗经》，章炳麟认为，司马迁说孔子是从古诗3000余篇中选出，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古诗中本有赋、比、兴：赋不歌而颂，“贵其多陈牖，而声歌依咏鲜用”；比，辩也，伏羲有《驾辩》，夏后启有《九辩》，“其文亦肆，不被管弦”；兴，“与主谏相似，亦近述赞”。可是，孔子却删去了赋、比、兴三类全部古诗。以此，《六诗说》中对此给予批评：“自孔子杂第次，而毛公独表兴，其比、赋俄空焉。圣者颠倒而乱形名，大师偏而失邻类，何其忘，遂至于斯邪？”当然，孔子从3000首以上古诗中取风、雅、颂三种，选取305篇，编为《诗经》，还是有其独特贡献的：“孔子所定，盖整齐其篇第，不使凌乱。又求归于礼义，合之正声，以是为节。”^{[7](P390-393)}这些评价表明，章炳麟对孔子删定六籍，虽然总的评价很高，却不是无条件地一味颂扬；对于删定的得失，努力持较为客观的态度。

相关文章表明，《检论》对孔子和儒家的评价较之《尚书》及1910年《尚书》手改本有了显著变化，但是，章炳麟仍是将孔子和儒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来对待，将浮屠、老、孔子及庄周共同视为“东极之圣”^{[7](P426)}。

《检论》中，研究中华原典和先秦诸子时，对李及道家学说的评价，较之《尚书》和1910年《尚书》手改本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评价变化一样，它反映了章炳麟本人经由辛亥革命的实践思想上发生的重要转变。他说：“章炳麟次道家师说，先为《原道》（见《国故论衡》），次作《齐物论释》，自以为尽其眇意。”然而，“遭时不淑”，在幽囚之中，他又有了新的心得，于是写下《道本》与《道微》。^{[7](P431)}

《道本》论老之书。章炳麟认为，韩非的《解老》和《喻老》对《老子》的“南面之术”作了完备的疏解，而“未及内心”^{[7](P427)}。他指出，将老之道当作“偷以苟容，怯以自全”，完全是“未窥其大体”^{[7](P430)}。《老子》的“大体”是什么？“道者，因贰以济民，行一不足以尽之”，“夫不持灵台而爱其身，涤除玄览而贵其患，义不相害，道在并行”^{[7](P427-430)}。这方才是道之本。

应用于人生实践，不是否定人的肉体存在，从而避开所有祸患，而是“非直贵身，又贵大患”，经历祸患而“超蹕返于太冲”。章炳麟指出：“夫吾无身者，吾无患矣。斯乃桑门小乘劣之行，怖畏生死，而期于远离五阴。彼大乘者，适贵其身与患俱，未遽避患也。”因为贵其身，方能体觉“人民困饿之，寒燠之，鳏寡之戚”；不历经祸患，身触其事，“则不能

诚心痛悼，以识人之疾苦”。只有既贵其身，又贵大患，方才会下决心去改变一切：“不体知也，固不能强毅赴之，赴之而或牵于礼法，有所当污身秽行者，则不能任权径行也。”^{[7](P428-429)}道家之说，不是消极避世，而是积极入世，章炳麟正是从这一点对老 作了高度评价：

夫精诚者，身知宠辱，以临大患，始获焉。是故以处工宰，则明白四达；以处布衣任侠，则穷窘之士委命；以处大师，则保傅天人，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转观作《易》之所忧患，在生生与未济也。身无穷，故人所托寄于我者亦无穷。驯致其道，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圣人之爱人终无已者，亦乃取于是者也。夫有身不期于大患，而大患从之；大患不期于托寄天下，而托寄天下从之；此老聃所为贵爱者哉！^{[7](P429)}

在对儒家、道家学说重新进行评价时，章炳麟对于忠恕作了新的诠释。他写道：

虞机虽审，权议虽变，岂直无本要哉？道在一贯。持其枢者，忠恕也。……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闻一以知十，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周以察物，举其微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故疏通知远者恕，文理密察者忠。……以知忠恕于学，犹鸟有两翮，而车之左右轮。学不兼是，苦沛将蔽之，……而况于躬行乎？……体忠恕者，独有庄周《齐物》之篇，恢 诘怪，道通为一。^{[7](P426-427)}

忠恕，在章炳麟这里，成了一般方法论，不仅是认识方法，而且是实践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方法。儒家与道家、孔子与老 思想的新解，实际上是要构建新的价值理性；而忠与恕的新解，则是在构建新的工具理性。如果说，《 廋书》重定本的意义在于颠覆传统的范式，那么，《检论》的意义，就可以说是努力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范式，这新的范式不仅有民族的形式，即中国所固有的话语，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容。

对于秦、汉以后中国思想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检论》的观点同《 廋书》及1910年手改本相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基本评价为：“赫赫皇汉，博士黯之；魏、晋启明，而唐斩其绪；宋始中兴，未壮以夭。”^{[7](P456)}为说明“赫赫皇汉，博士黯之”，《订孔上》已指出：汉初“诸儒睹秦余敝法，欲有更易，持之未有其故，由是破碎六籍，定以己意，参之天官、历象、五行、神仙诸家，一切假名孔氏，以为魁柄，则六籍为巫书。”^{[7](P424)}《学变》更直斥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是为“神人大巫”^{[7](P444)}。为说明“魏、晋启明”，《 廋书》手改本原拟加入《五朝学》，《检论》中终于未加，但是在《学变》中增加了这方面的论述，所附《黄巾道士缘起说》专门说明，从张陵、张鲁之伦到黄巾道士，虽主习老子五千言，“斯乃古之巫师，其术近出墨翟，既非老、庄，并非神仙之术也。”^{[7](P447)}“唐斩其绪”，是《检论》突出提出的新论点，为此，新增了《案唐》一文。“宋始中兴”，也是《检论》对宋学新的评价，《 廋书》中的《学蛊》因此为《检论》中的《通程》所取代。“未壮以夭”，则在《议王》与《清儒》中得到论证。

在1910年发表于《学林》第1册的《五朝学》中，章炳麟对魏、晋、宋、齐、梁、陈的文化学术作了辨析，其时，对唐代文化与学术就已加以挞伐。“粤晋之东，下讫陈尽，五朝三百年，往恶日 ，而纯美不忒，此为江左有愈于汉。”^{[8](P76)}文章列举众多史实，证明五朝社会风气并不比汉末更差。而在专评五朝玄学时，章炳麟突出说明：“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忤，且翼扶之。”在历数五朝学者算术、地理、音乐、礼学、律令等方面的成就后，他指出：

夫经莫穹乎礼、乐，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诸名士皆综之。其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凡为玄学，必要之以名，格之以分，而六艺方技者，亦要之以名，格之以分。治算，审形，度声则然矣。……故玄学常

与礼、律相扶。自唐以降，玄学绝，六艺方技亦衰。 [8](P75-76)

他在注中论唐代六艺方技衰退时更具体指出：“唐初犹守六代风，颜[师古]、孔[颖达]、陆[德明]、贾[公彦]之说经，李淳风、祖孝孙之明算，孙思邈、张文仲之习医，皆本六代。……中唐以降，斯风绝矣。” [8](P76)

在论述玄学与社会风气的关系时，章炳麟指出：

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及唐，名理荡荡，夸奢复起。

在注中，章炳麟更指出：

“唐人荒淫，累代独绝。……又其浮竞慕势，尤南朝所未有。……唐人小说，半皆妖蛊，文既无法，歆羨荣遇之情，骄淫矜夸之态，溢于楮墨。人心险薄，从是可知。” [8](P76)

章炳麟批评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认为“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称赞“五朝士大夫孝友醇素，隐不求公车征聘，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贤于季汉，过唐、宋，明益无訾。” [8](P76-77)

这篇《五朝学》，虽编入《太炎文录初编》，已很明白阐述了《检论》中“魏、晋启明，而唐斩其绪”的论点。《案唐》劈头指出：“隋、唐以科目更世胄，故鱼盐之士、管库之吏兴。匹夫有善，无勿举也。虽衰世，犹有俊杰。此其贤于前世。及乎风俗淫，耻尚失所，学者狙为夸肆，而忘礼让，言谈高于贾[谊]、晁[错]，比其制行，不逮楼护、陈遵。”章炳麟认为：“尽唐一代，学士皆承王勃之化也。” [7](P450) 这是因为王勃编定王通《中说》及《文中子世家》，使王通夸诈之风得以盛行于唐：

夫其淫为文辞，过自高贤；而又没于势利，妄援隋、唐群贵，以自光宠。浮泽盛故虑宪衰，矜夸行故廉让废。其败俗，与科目相依，而加劲轶焉。终唐之世，文士如韩愈、吕温、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皇甫之伦，皆勃之徒也。……韩、李之徒，徒能窥见文章华采，未有深达理要、得与微言者。……文辞不艾，上者欲删《诗》、《书》，定礼、乐，自拟周、孔，下亦仿佛稷、契。卒其政论高下，未及仲长统、刘劭万分之一，而况于孟、荀乎？ [7](P451)

学风、文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由此而败坏。章炳麟就此进一步写道：“唐世纯德卓行，时有一二，……然于当世风俗醇媮，不加损益，比于半冰不足以寒一治之炭焉。扬其人，色厉而志荏，内冒没而外言仁义，夫非勃《中说》之流欤？” [7](P451-452) 当然，唐代学术、文化也不是毫无成就。“其卓犖自得，又不违于质信者，唐世亦非无一二也。史如刘知几，政典如杜佑，谋议如陆贽，齐此则止矣。” [7](P452)

《廋书·学蛊》原认为“赫赫皇汉，博士黯之。自宋以降，弥又晦蚀。” [7](P147) 《检论·通程》不仅在两句之间加入“魏、晋启明，而唐斩其绪”，而且将“自宋以降，弥又晦蚀”，改成了“宋始中兴，未壮以夭”，由“晦蚀”变为“中兴”，表明章炳麟对宋代思想、学术与文化的评价有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学蛊》称程、朱之学为“蛊民之学” [7](P146)，《通程》则对二程作了肯定性的评价。“宋始中兴”，主要指二程之学能上接魏、晋，引导宋代重新开始理性的思考。他写道：

魏、晋间，知玄理者甚众。及唐，务好文辞，而微言几绝矣。宋自庆历，始有儒言。……其后始审谛，有内心。……窥其作始，周、邵近阴阳、纬候；惟张氏尚，亦淫于神教。善作述者，其惟二程耶？降度闽、婺、永嘉、四明之说，指要不同，

始皆本于程氏。[7](P453)

周，指周敦颐；邵，指邵雍；他们的代表作，前者是《太极图说》，后者是《皇极经世》。张氏，指张载，代表作为《张子正蒙》。二程，程颢、程颐。闽学，指朱熹一派学说；婺学，指吕祖谦一派学说；永嘉，指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一派学说；四明，指黄震一派的学说。章炳麟认为，二程承前启后，在宋代思想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通程》评价程颢《定性书》“可谓旨远而用近”，认为程颢所说的“圣人之常情，顺万事而无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和老所主张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及“无为而无不为”相通，并特别指出：“此所谓无情者，谓不任私情，非谓灭绝情欲。……纯去情欲，则无利济之念。”《通程》以此为二程学说的核心和最有价值的部分，说：“综观二程之所经纬，时或杂，亦往往以己意专断。然大当以《定性书》为主。明其为主，其他得失，可县衡而定也。”[7](P455)

然而，二程之学虽呈中兴之象，却终于还是“未壮以夭”，这是因为：“夫辨析名相，字有封界，虑非二程之所能也。重以性命仁义之训，自古已樊然乱矣。不能疏观人物品性，明征迹状，而徒诊察儒书，求之故训同异之间，其范围终不远轶。斥人支离，而支离随之；恶人玄虚，而已之玄虚如故也。”[7](P456)

与《定性书》及手改本中《王学》不同的《检论·议王》一文，结合王守仁之学进一步讨论了宋代以来思想、学术与文化的发展。文章比较了程颢、朱熹及王守仁三人学术的差异，指出：“程伯子，南面之任也；朱元晦，侍从乡之器也；王文成，匹士游侠之材也。……夫《定性书》者，顺众而无诚；格物论者，博观而无统；……文成之术，非贵其能从政也，贵夫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7](P460-461)文章指出，阳明之学说不上多么玄远，以其知行合一论而言，便是一隅之论，因为“未有不作意而能行者，作意则行之端矣，是故本其初位，行先于知也。心所取象，为之意言，然后有思，思者，造作也。取象为知，造作为行，是故据其末位，知先于行也。怒斯作气，惭斯颜，哀斯陨涕，惧斯振栗，喜斯嫫，是故别其情态，知行同时也。……文成所论，则其一隅耳。”[7](P460)文章还比较了陈亮、叶适和王守仁、以反严嵩而知名的徐阶两派学术的差异，指出：

世之苦朱[熹]、吕[祖谦]者，或贵陈、叶，或贵王、徐。……陈、叶者，规摹壶广，诚令得志，缓以十年，劳来亭毒，其民知方，可任也，而苦不能应变。王、徐者，其道阴鸷，善司短长，乍有祸乱，举之以决旦暮之胜，可任也，而苦不能布政。……然效陈、叶者，阔远而久成；从王、徐者，险健而速决，……然其飞钻制伏之术，便习之，则可以为大。[7](P458)

为此，章炳麟评定阳明学“其术足以猝起制人，不足以定天保、仆大命”，并说：“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历纤理则宕往而疏越。……故其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此皆王学所偏短长也。”[7](P458、459)显然，这也是“宋始中兴，未壮以夭”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

《许二魏汤李别录》，为元许衡，清魏象枢、魏裔介、汤斌、李光地传略，较之《定性书·别录乙》，改动不是很多，但在叙述每人谥号之前，都加了一个“伪”字，突出了他们都投降异族政权，被赐“伪谥”。全文末增写一小段，称：“昔孟、荀歿而儒术衰。自孙奇逢、李二曲以后，……学不行远，而小成荣华者好之，程、陆所传亦亡矣。”[7](P466)突出了这篇文章主题，即以这一批儒学代表者为标志，二程、陆九渊所传之学，也已式微了。

论清代思想、学术与文化的文章有四篇：《哀焚定性书》、《正颜》、《清儒》、《学隐》。《颜学》原先虽批评颜元、李塉不知概念抽象，但认为他们重视实践，“自荀卿而后，颜氏则可谓大儒矣”[7](P153)。《正颜》中删去了这一总的结论，而加大了批评的力度，指出：“颜元长

于射、御、礼，本粗疏；乐、书、数，非其所知也。其徒李璿言数，则祇记珠算之乘除；言书，则粗陈今隶之正俗。市侩之数，学究之书，而自谓明六艺，可鄙孰甚？至所谓兵农、水火、钱穀、工虞无不娴习者，则矜夸之辞耳。”^{[7](P470)}颜元有所所长，但距离“大儒”的标准仍很远：“大言礼、乐、射、御、书、数、颜氏固弗能尽习也；就其习者，无过胥史市井之用，固弗深致学任驱使，而以内圣外王在是，则道术自此裂矣。”^{[7](P470-471)}《馗书·清儒》论汉代杜预、贾逵、马融、郑玄注释经书，“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其后，“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7](P155)}，《检论》中这一变化状况改成“变于魏、晋，定于唐，及宋、明始荡”^{[7](P473)}。纯就经文考据而言，《检论》中的判断显然更加符合实际。对于清代朴学，章炳麟继续肯定了它在求古代经文经义之是方面的价值，而对于将其学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则更尖锐地进行了抨击，这集中在他为《学隐》一文新写的结论之中：

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微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微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寡尤之士也。者或不识人事臧否，苟务博奥，而足以害民俗，乱政理。自惠氏为《明堂大道录》，已近阴阳。……延及康有为，以孔子为巫师。诸此咎戾，皆汉学尸之。要之，造端吴学，而常州为加厉。……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大者为汉奸、剧盗，小者以食客容于私门，三善悉亡。^{[7](P481)}

这一结论，不仅针对清代朴学，而且直接针对清末以来思想、学术与文化发展中的倾向性问题。先前论汉代、魏、晋及唐、宋、明思想、学术与文化，也都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但这一组论文，更为注重的还是从总体上揭示各代文化、思想和学术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趋向，为建设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提供历史资源，指明正确的路径。可以说，《检论》卷二、三、四，就是一部非常有创见的简明扼要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

《检论》卷五各篇，如《民数》、《方言》、《订文》及附录《正名杂义》、《述图》，论中国人口数量、语言文字及图形表象，改动都不很多。

《检论》卷六各篇，《正义》、《商平》、《原教》、《争教》、《订礼俗》，集中分析中国文化影响最为广泛的观念、偶像及礼教崇拜。

《正义》系新写，破对于尧、舜、禹“禅让”的崇拜，显然也针对当时袁氏党羽所制造的一种舆论，即袁世凯系由清廷禅让而取得政权，而非依靠革命取得政权。文章指出，唐、虞之世，诸侯分立，自理其土，尧、舜、禹只是为众诸侯所翼戴的伯主，根本不可能以其伯主之位私相授受。“夫古者法统未一，天王之法，自监、牧、公、侯推之，尚犹不可私付其臣，况于后代郡县之主，与方伯盟主异体乎？”一个个号称禅让而建立新王朝者，无非是以此为名，行篡盗国家之实，其间，诛口口异己，烹灭敌国，并不稍逊于起于草口口者。所以，“事之荒唐淫伪者，莫过于禅”^{[7](P514-515)}。章炳麟还特别指出：

乃夫晚世所谓禅让者，犹两寇相袭也。黜其魁帅，而任其小，其贼民乱化则如故。故诸所与共政者，皆前代窃位、败政、逋臧之余，飞廉、恶来之亚也。校课羸绌，与旧朝未有以相胜。夫征诛而得之者，政虽草创，其旧污则已荡芟矣。彼之多纯，而此之少算，其醇固不相比。^{[7](P518)}

这显然直指袁世凯取清王朝而代之，“贼民乱化如故”，也是对当初未能通过革命征诛而荡芟旧污深切痛悔。

《商平》由《平等难》改定，集中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主要应是政治的平等：“事之宜平者，独有君臣。诚不宜世及相授，尊其礼秩，建其童昏，令驛然肆于民上。”^{[7](P520)}文章指出，当权者一旦掌握了中枢权力，“欲引而下之，固已难矣”。解决的办法，是“不阿势藉，不挠货财，以投鉤定去留，以三载考绩易主”，这样方才能使当政者不能“纵恣自保”。^{[7](P521)}

《原教》所破除的是对于天神、地祇、人鬼的崇拜，对于封禅、谶书、数术纬候以及河图、洛书、石马、石玺等人造的或天然的偶像的崇拜迷信。《争教》所破除的是对于景教及远西的盲目崇信。《订礼俗》起首新增一大段，更为明确地要求挣脱旧的礼教与习俗的桎梏，强调礼俗必须与时间、地点的改变相适应：

章炳麟曰：十祀不同风，百里异教。是故傅瑕有言：“三代之礼，体弘致远，不应时务，事与制违，名实未附。”然则文质相变，尚矣。……礼，时为大，而地次之。^{[7](P531-532)}

在《齐物论释》中，章炳麟就一再要求破除对于名相的迷信和执著，要求人们不再为自己所确立起来的观念所桎梏，为自己所迷信的观念所主宰。《检论》新增《正议》，重新撰定《原教》，对《争教》及《订礼俗》作部分修改，更突出了这部著作的时代性。在袁世凯统治之下，章炳麟认为，首先要破除的正是这样一些最易淆乱人们视听的观念、偶像及礼教崇拜。

《检论》卷七各篇论两千年来中国大一统依靠哪一些制度建设得以保障和维系，在新时代这些制度应当如何变革。

《通法》一文，较之《 廋书》同题之文，第一节中就增加一段，说明自秦至明“大齐长于异国者四物：一曰仁抚属国，二曰教不奸政，三曰族姓无等，四曰除授有格。”^{[7](P541)}在结论中又突出了这四点，说：“最述中夏一统之政，二千年矣。量其精善可久者，四事。”^{[7](P545)}

在评述各代制度建设方面的贡献时，《通法》特别增写了一节，论“秦之政，可法有一焉”，这就是：“昔者，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杀王之亲者辜之，民是以有等威，族是以有阶次。虽圣制不能离于酋长，自营为，亦甚矣。秦始皇用李斯，大涤旧污，身为天子，而子弟为匹夫。……今远西、日本，犹尊皇族，盖世酋之流。独中夏少脱，是则秦皇之庇民也。”^{[7](P541)}与这一段直接呼应的是收录在《太炎文录初编》中的《秦政记》一文，其中高度评价秦代这一政治举措，说：“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秦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文章还特别称赞秦皇能够“持法为齐”，说汉、唐以下，“建国之主，非起于草茅，必拔于搢绅也。拔于 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草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 跌，而不能守绳墨。独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草茅、搢绅所能拟已。”^{[8](P71-72)}在《检论》新撰写的《官统上》中，章炳麟历述周、秦以来各代官制，认为“官统之异，大别不过周、秦二家。自汉迄江左，多从秦；宇文、杨、李以下，多法周。……通校二家，周以贵族，而秦优齐民，其阶级平 亦异。当今之世，固当慕齐民，不当慕贵族也，则秦、汉、八代为合，而姬周之制，宇文、唐、宋、明、清之法，悉当弃置不用。”^{[7](P546-548)}这段论述，主旨与《通法》及《秦政记》完全相合，显然都是谋求从制度上根除封建传统。

《通法》中对新与晋、魏、隋、唐的均田之政曾详作介绍，并要求“后之林 ”要以“有均田，无均富；有均地箸，无均智慧”的方针来“调均事产”^{[7](P544)}。章炳麟充分意识到土地问题在中国大一统国家存在和发展中的重要性，但是，在《定书籍》中，他删去了《廋书·定书籍》中原先所附的《均田法》，而在正文中增写了一段，说明中国方域广袤，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因此：“宽乡宜代田，狭乡宜区田，独宽狭适者，可均田耳。辅自然者重改作，今欲惠佃耕，宜稍稍定租法。”^{[7](P569)}这既反映了他对于国情更为真切的了解，也表现了辛亥革命后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的动摇与退缩。他希望能通过革命战争，涤荡旧朝污浊，诛鋹泰半旧吏。但是，没有农民的发动，又有谁去进行这场革命战争？而没有土地革命，农民又怎么能真正发动？章炳麟对此却缺乏觉悟。

《检论》卷八，选择若干历史人物，论在汉族与历史上其他民族冲突中，特别是在清朝统治下，应当如何行事居处。《扬颜钱别录》于扬雄、颜之推、钱谦益之外，又增列了一批有类似遭遇的人物，未作多大修改；《杂志》述曾国藩，增补一句，说明曾国藩刊行王夫之遗书，“可谓知悔过矣”^{[7](P583)}，又增补一大段述梅曾亮晚年为太平天国延致之事。《哀清史》述清代史传书志、奏记文牒作伪失实难以凭信，与《楹书》相较，改动不大。附录《近史商略》，评论拟修《清史》者所定叙目的纰缪。新撰写的《对二宋》，除记与宋恕讨论立宪为要还是以“除胡虏而自植”为本外，还记述了与宋教仁讨论曾国藩、左宗棠当如何评价的情况，说明曾、左之伦的成功，有其特殊的社会基础与文化背景。这一卷，所论涉及人的操守、气节、品行、功业等等，关注时代转折时刻人们文化素养和秉性、人的本质，将向何处发展，让人们引以为鉴。

《检论》最后一卷即第九卷，可视为全书的总结。不过，这一总结，不是对前八卷作一概括，而是将对中华文化的总检核，落实到如何直面袁世凯统治下的严峻现实，吸取历史经验，挽狂澜于既倒，救神州于陆沉。

这一卷首篇文章《非所宜言》，说明“今之朝士”一再“犯分陵贤”，已使袁世凯政权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支持者，所有能维系国家使之有效运行的力量。文章指出，这一政权已完全背弃了“操本以致息，飭力以自养，物行滥则不讎，言伪缪则不信，群众大法制之而不敢轶其绳”的市井良人，即城市工商业者与手工业者；这一政权已经完全抛弃了胥史执持法章和科目之人辨文句、理书牒的传统，执政者“轶法而自用”，诛求无度，“抱律而不得条，佐史持牒而不能检”，行政混乱黑暗；这一政权，对于归来从政的留学生，“摩上则不用，所以厉民则取之；议守法法则不任，议近黠术则听之”；这一政权，执政者多为“亡国所遗从政之士，斗筲之才”，他们“偷在息，不恤壶漏，倾移以后，苟可以乾没者，虽亡邦邑，他日愿为敌国隳俘而已矣，非徒不恤其国也，虽身亦自外之”；另一些执政者，“畴昔鸣弦击，猱杂倡优，废产业而为游手”，稍后“舆金事师，巧笑先意，暮夜遣妇而望门阙，正昼委身以承狎幸”，而一旦执掌权柄，“持权夸咤，倾动风尘，一夕投琼斗筲之所出入，或当数县赋调正供，法吏眙目不敢诘”^{[7](P602-604)}。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国家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中，国家的命运可想而知。《检论》卷九随后一再强调，革命改制必须尽诛旧朝贪人墨吏，所针对的正是本文所描绘的政治现实。

随后三篇《商鞅》、《思葛》及《伸桓》，论商鞅、诸葛亮、桓温三个历史人物。《商鞅》较《楹书》改动不多，增写一段：“鞅固受李悝六篇，次有萧何为《九章》，犹然如画一。刑之乱，君之擅，本于‘决事比’。远不本鞅，而近不本萧何。”^{[7](P605)}进一步突出了商鞅以法治为本，与董仲舒、张汤、公孙弘恣君抑臣全然不同。《思葛》对《楹书·正葛》的立论作了纠正，并增写了原文两倍以上篇幅，阐明诸葛亮的历史功勋、历史地位。文章强调“武侯本布衣诸生，规在救民，……其以抚和黎庶，远倾敌国，道至弘矣”；辨明关羽荆州之败，是刘备“褊迫疏慢为之”，责任不在武侯；认为武侯最终事不大定，功不速济，一是因为蜀地偏狭，身又早夭，二是因为“魏氏苛慝未作”，尚未丧失民望。^{[7](P609-611)}《伸桓》为晋桓温鸣不平，对桓温“痛心戎狄，攘除奸凶”、“宁屈私忿，不使中国毙于异类”、“光复之志，治戎之略”，都给予高度评价，指责“晋氏之忘民”及世家大族阻挠移都洛阳，终使“区宇遂不可一，戎貉之氛，贻于百代”^{[7](P613-615)}。这三篇文章置于卷九，显然都是感于时而发。在这三个历史人物和他们的功业上，寄托了章炳麟本人的追求与理想。

小过、大过，俱出自《易》。小过，下艮上震，。全卦六爻，四柔二刚，四柔集中于中间，二刚居初上本末之地。阴大阳小，阴柔过而阳刚弱，是为小过。《经》：“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彖》：“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象》：“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9]《检论》中用作篇题，说明革命党人内部柔过于刚，以小私而害大义，未能协调好内部关系，保持内部团结，“侮唇齿之援，弃同

德之好，远忧勤之人，而任 扰之士”^{[7](P624)}，成为招致革命由胜利转向失败的重要内在原因。

大过，下巽上兑，。全卦六爻，四刚二柔，四刚集中于中间，二柔居初上本末之地。阳大阴小，阳刚过而阴柔弱，是为大过。《经》：“大过。栋桡。”《象》：“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象》：“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世无闷。”^[10]《检论》以大过为篇题，指反革命力量盘根错节，力量远较革命者为大；未能摧毁旧势力，而以为革命胜利可以靠侥幸获得，这是革命最终导致失败的外部原因。

《小过》与《大过》之后，《检论》卷九最后一篇是《近思》，再次强调：“废兴之际，玉步可改，裳服可变也。其故吏亲媚者，天性狃为附庸小腆，染于亡国旧污，而不与玉步裳服偕亡。不刚制则不去。”文章指出，围聚在领袖身边的这些人，“说其主者万端，非为惠中国、四裔也，外侮于强敌，而内犹劫持其民，多为 牙，以自保固”，终使“民以失职，莫申其性”，使领袖人物“受其胁 持，…… 申宫以守，任奸以廉事，……处之若拘囚”。章炳麟认为，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成功的领袖人物，必须做到“大任不下敌，故不自斫；大勇不辞患，故不深防；大断不受制，故不牵于 近”^{[7](P624)}。他以为，汉孝文帝就是做到这几点的一位皎皎者，“孝文独以端居无为亭毒其民，仁不容奸，而法不司隐，使人人得以缓带而议，阔步而游。是故其民免于毒螫，怀其国常，廉耻始兴，以降叛为诟。”^{[7](P625)}近代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之所以取得成功，也是因为他们都能“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强死”。可是，纵贯当今中国，这样的领袖人物“几不可睹”，所以，他悲叹：“中夏之迹，殆乎熄矣。”^{[7](P627)}这里谈的是领袖人物，实际上表现了他对于革命党人能否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已经非常怀疑，甚至可以说，已经几近绝望。但是，《近思》的结束语表明，章炳麟并不甘心让神州大地就此陆沉：

乌呼！斯土也，凝之甚难，而判之甚易。始自庖牺、炎黄，斩其荆棘，以廓九有，帝王任之，伯者匡之，孝文以降，更惠绥之。勤以 牧圉，而劳以备文物，然后成于斯名也。若何堂堂举此美壤而佗属邪？^{[7](P628)}

也可以将这段结束语视作《检论》全书的总结论。对于中华文化的全面检核，就是要从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化的创造、中国历史的发展的总审视中，发现问题的症结，发掘推动中国得以前进的动力资源，激励人们继续进行奋斗，谋求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这应当是《检论》一书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章太炎.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 [2] 汤志钧. 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78-480.
- [3] 时报[M]. 1915年5月22日.
- [4]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第七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367-368.
- [5] 章太炎. 章太炎先生家书[M]. 46-47.
- [6] 章太炎. 章太炎书札[M] (抄本第3册). 浙江: 浙江图书馆藏.
- [7]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第三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8]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第四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9]周易.小过第六十二[M].

[10] 周易.小过第二十八[M].

The Meaning of 《Jian Lun》 in Cultural Historical

Jiang Yihua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The writing of 《Jian Lun 》 started from revising 《Xu Shu 》 . But they are largely different in content and quality. The goal of 《Xu Shu 》 is to overture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pattern and lead people to screw Chinese history、institution and culture from new view. But the goal of 《Jian Lun 》 is to create a construction and supply a criterion for knowledging Chinese culture wholly. 《Jian Shu 》 makes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for examination for the historical fame of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origin、cultural cre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t find the vitality of question and push China to go forward.

Key Words: 《Xu Shu 》 , 《Jian Lun 》 , Zhang Taiyan

收稿日期: 2002 年 12 月 20 日。

作者简介: 姜义华, 男,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